

#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及其制约因素<sup>\*</sup>

——以汉语典籍《文心雕龙》的英译为例

范祥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近年来兴起的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领域,目前,尚有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探究。本文试图以文化专有项理论为基础,通过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探讨《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并探究策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为汉语典籍的翻译策略寻求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观察翻译的整体特征,而且可以为汉语典籍翻译提供一种参照,同时为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尝试。

**关键词:**汉语典籍英译;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制约因素

**Abstract:** The rise of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which promis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are, however, varieties of issues the exploration of which wants to be intensified.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resort to the theory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at of example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uch items in Wen Xin Diao Long and explore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their choice with a view of making legitimate explanations for their choic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 general.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that research of this type not merely conduces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ed texts bu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makes a methodological attempt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ulture-specific item; translation strategy; constrain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8)06-0061-04

## 1 引言

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近年悄然兴起,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领域。迄今,除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外,学界还召开了四届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会议,就典籍英译的理论、译者的文化态度、汉语典籍的传播和影响等进行了专门的讨论。然而,典籍英译研究起步较晚,就这一论题的研究尚有十分广博的研究空间。尤其是,汉语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汉语文化信息,针对那些文化词汇和表达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制约因素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选择译本进行个案研究,为翻译策略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些对认识汉语典籍翻译的性质和翻译实践,都具有突出的研究价值。下文将以汉语古典文论《文心雕龙》的一种英译本为例,探究其中对文化信息的传递策略及其解释。

## 2 文化专有项理论

众所周知,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操作,更是文化传递活动,但研究者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文化“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受方法约束的随心所欲的对象”(李春泰,1995:2)。国内研究者试图通过分类法来概括文化差异的翻译方法,但均存在分类法上的片面性,而艾克西拉(Alexeï)提出的文化专有项及其翻译方法,在设计目的、研究取向、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更全面,也更具有合理性”(张南峰,2004:20-22)。在张南峰(2004)看来,一个语言

项目成为文化专有项,不仅取决于其自身,而且取决于其在接受文化文本中的功能;只要对一般读者或目标文化中任何有权威的人来说,这一语言项目“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上造成不透明性,或造成可接受性的问题,它就是文化专有项”。另外,由于跨文化交流的作用,文化专有项的确定还取决于时间。(Alexeï, 1996: 58-59)

艾克西拉(1996: 59-60)从译者的视角将文化专有项区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表达,前者又被进一步区分为常规专有名词和负载专有名词。大多数专有名词都很有规律性地遵从先在的翻译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专有名词只使用一种翻译策略。负载专名的翻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不过对其组成成分进行语言(指称或非文化)的翻译已成一种趋势。普通表达指不是专有名词的文化专有项,其翻译趋势是重复、改写或音译,除非有传统的定译。但是,此类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要复杂得多,因为有许多因素产生极大的影响(Alexeï, 1996: 59-60)。艾克西拉(1996: 65-70)以描述的方法概括出11种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还探讨了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他关于文化专有项的论述是基于小说翻译的描写研究,张南峰(2004: 22-23)也以小说的英译汉为基础对以上翻译策略做了修改,但两者的论述对观察《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均有不足。

## 3 《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鸿篇巨制”,共50章,37000多字<sup>①</sup>(杨国斌,1996:17)。我们选择考查了正文1-3章、26

<sup>\*</sup>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SJD740023)。

**作者简介:**范祥涛,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近现代中国科学文化翻译史

**收稿日期:**2008-04-19(修改稿)

—28 章,以观察其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其中的文化专有项包括:属于专有名词的人名、地名、朝代、典籍、文论术语、哲学术语等,普通表达包括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对照 50 个题名和英译,以及艾克西拉的策略分类,发现其分类并不对应于所观察到的文化专有项,主要原因包括:其分类并非依照统一的标准;分类是基于对英法翻译文本的观察;没有对每个类别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区分。因此,用于观察汉语典籍英译有诸多重叠,如语言翻译和绝对泛化。因此,其分类有很大程度的特殊性,张南峰的修改也同样如此。当然, Aixel (1996: 52—53, 60)也提出,分类并非客观描述实际存在的翻译策略,而是着眼于研究的方法论。(张南峰, 2004: 19, 23)

对选用于实证研究的 6 章中,我们试图按照人名、地名、朝代、典籍题名、文学术语、哲学术语、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统计其中的文化

	翻译策略												合计	比例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人名	33		3	9							6	4	55	10.9
地名				2							1		3	0.6
朝代				11									11	2.2
典籍题名		2	1	13			1	3			18		38	7.5
文学术语	2	92	6	19			110	39	12		1		281	55.8
哲学术语	2	41		5		2	35	11	3		14	3	116	23.0
合计	37	135	10	59		2	146	53	15		40	7	504	
比例 (%)	7.3	26.8	2.0	11.7		0.4	29.0	10.5	3.0		8.0	1.3		
分类比例	47.8				42.9						9.3			100

统计中,除音译、文外注释、文内注释、删除等可以相对容易确定外,其他几类多有重叠或难以确定之处。定译指那些在英文中已经通用的译文,其他指不能包含在前 11 种之中的翻译策略。统计显示,人名以音译为主。《文心雕龙》的历史和神话人名达“五百”之多,“有时用官衔,有时用姓,有时用名,有时用‘字’”,翻译时为避免混乱一律用“姓名全称”,而且除个别情况外,人名翻译不做注释(杨国斌, 1996: 39)。当然,人名翻译除音译还有另外 22 种,文外解释的形式是尾注,译文全部尾注 294 例(刘勰, 2003: 723—760),所选 6 章分别有尾注 41 例。有研究称,除补充解释功能外,注释甚至成为特拉普翻译维吉尔典籍的一个额外“卖点”(Lefevre 1998/2001: 51)。浏览尾注会发现,选择人名注释有一定的随机性。文内注释是在音译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程度的人物身份说明,如“益稷”(Bo Yi and Hou Ji Shun's ministers)等。6 种定译均为“孔子”的名、字、号等的英译“Confucius”。“其他”4 种译法多为人名在原文中的隐喻使用,如“孔融”(Kong Rong's works)。

所选材料中的地名只有三例:“太山”(Mountain Tai)、“河”(the Yellow River)、“淮南”(the Prince of Huainan),两个用定译,一个用文内解释。朝代名称在音译之外增加文内解释或译出其隐喻意义,如“唐虞”(the times of Tang and Yu)、“(锡)魏”(the imperial edict honoring Cao Cao the Lord of Wei)、“楚”(the Songs of the South)等。典籍题名多用定译,如“《易》”(the Book of Changes)、“《八索》”(the Eight Explorations)则是典型的“指称翻译”,“绝对泛化”一例是译“《骚》”为“a work of rhyme-prose”。文学术语和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有以下特点:(1)音译数量很小;(2)指称翻译策略使用显著,占两类总数的 34%弱;(3)绝对泛化在全部翻译策略中数量最大,占 37%弱;(4)哲学术语翻译中出现一个可以被看作“有限泛化”的例证:“经理玄宗”

专有项。但是,艾克西拉的分类只可用于观察前四种专名,确定具有文化特征的典型专有术语却有一定难度,而“那些不是专有名词的文化专有项使问题变得复杂得多”(Aixel 1996: 60),文化信息会在并非可以称为“表达”的语言单位内出现,对其确认和研究难度也更大,不是“文化专有项”的概念所能涵盖,因此下面的统计首先只涉及专名术语。文论术语和哲学术语的统计,分别选取“文、体、风、骨、篇、章、辞、笔、情、性、术、韵、言、志、字、旨、意、义、喻、雅、学、习”和“圣、道、德、经、神、理、思、气、天、象、心、精”(参见王晓路, 1999; 胡亚敏, 2003),以及包含它们的短语,并重复统计每项。翻译策略则在艾克西拉分类的基础上略做修改:①音译;②指称翻译;③文外解释;④文内解释;⑤使用同义词;⑥有限泛化;⑦绝对泛化;⑧移植;⑨删除;⑩自创;⑪定译;⑫其他。<sup>②</sup>统计结果见下表:

(Daoist),但这种策略至少在汉语典籍英译中少见。

上表中纵列的比例在这里没有明显的意义,因为在不同的典籍中那些可以识别的文化专有项的类型应有区别。不过,横行的比例就翻译策略而言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我们所选材料已有代表性和平衡性,那么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向上显然倾向于“指称翻译”和“绝对泛化”,也在较高程度上使用“文内解释”和“移植”。分类比例进一步显示,译者在更高程度上使用了“保留”或“异化”的策略,而“替代”或“归化”策略的使用也保持在略低的水平。最后,就汉语典籍的英译而言,艾克西拉的策略分类标准不统一,应采取开放性的态度才能充分描写“译者可能采用而且已经采用过的可行策略”(Lefevre 1992: 101)。当然,统计数字是相对的,只是通过在严格说明统计过程的基础上得出数据,帮助阐述一些整体趋势,因为统计结果会受到操控,对统计的说明也会受到操控(Pym, 1998/2007: 71—72)。不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大多数描述均基于统计,主要是百分比及其所反映的趋势”(Pym, 1998/2007: 71)。尽管统计结果并非总是有说服力,它们却为研究和认识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其实,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中更复杂的文化问题出现在对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的观察中,因为这种观察很难诉求于有效的方法,只能观察、比较和研究实际的翻译文本。《文心雕龙》的译者对两类例证的处理方法大致分为文内解释和文外尾注,而且多数情况下以尾注解释。

(1) 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征圣)

When the state of Zheng invaded the state of Chen, Zheng's minister Zi Chan displayed eloquence in convincing Jin, the overlord state of the justice of the invasion. For its brilliance Confucius' pupils recorded the diplomatic repartee at the feast the state of

Song held for the guests of Jin

(2)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原道)

The Yellow River Diagram contains the eight trigrams and the  
Writing from River Luo Diagram reveals the nine grea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上例均以文内解释处理文化信息,第一例解释程度更高,并辅以后注。传说“河出图,洛出书”更以较长的尾注说明其意思,并提及理雅格英译《易经》中绘制的图形(刘勰,2003: 723)。《墨子》中有“河出绿图”,英译为“The mysterious chart emerged out of the Yellow River”(王宏,2006),两译者对同一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显然不同。除尾注外,译者还在译著最后提供两个附录:“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和“人名录”,前者上起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后者则以22页的篇幅,用英汉对照的方式简要介绍书中的人物。这些对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无疑会起到积极而重要的辅助作用。

#### 4 文化专有项翻译的制约因素

翻译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选择过程,而制约译者态度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因非常复杂(Lefevere 1992: 87-91)。西方翻译研究中文化学派研究者对这些制约因素论述颇多,Lefevere(1992: 11-40)探讨了影响或制约翻译选择的多种因素,包括文学系统、赞助人(意识形态、经济因素、赞助人地位)、诗学(Lefevere 1992: 11-40)。但是,其论述甚至受到西方研究者的质疑(Hemans 1994: 139-142; 1996: 41)。艾克西拉(Aixel 1996: 65-70)列举并解释了超文本因素、文本因素、文化专有项的性质、文本内因素等,且划分出15种原因。由于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其论述庞杂有余而系统性和突出重点不足,应用来观察汉语典籍英译的策略选择也不尽合适。

对翻译选择产生影响或制约的因素,涉及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制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此语境下形成的翻译目的、译者、文本、读者等(参见范祥涛,2004: 61-64)。下面结合译本中的例证,简要阐述这些因素。

##### 4.1 历史文化语境

翻译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必然受到其中主导文化因素的制约,主要有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经济实力。汉语典籍英译发源于1995年,此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民国、建国初期等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参见范祥涛,2006: 3-7, 207-214),世界意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等跃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层次。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弘扬民族文化随成为政府和学者的一种共识。中国出版总署署长指出:“新闻出版总署将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积极发挥优势,把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事关全局的一件大事”。(王凌,2005)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发起和组织汉语典籍翻译工程,并将其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杨雪梅,2000)。一定历史语境下的各种因素“制约了翻译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Lefevere 1992: 16),也必然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已不完全是个体行为。《文心雕龙》译者很大程度上的异化策略(47.8%)倾向,无疑反映了传播文化的主流意识。

##### 4.2 翻译目的

翻译是有目的的,它们又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多层次翻译目的制约各阶段的翻译选择(范祥涛,2002: 26; 2004: 62)。汉语

典籍的英译目的在发起翻译之初就得到清楚地表述。《大中华文库》总序称:“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通过中学西传,纠正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歪曲。(杨牧之,2000)

作为《大中华文库》的组成部分,《文心雕龙》英译的目标也不例外,译者的翻译目的就是向英语读者传达原著中的中华文化,因此在更高层次上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翻译文化专有项,甚至译“风骨”为“wind and bone”,译“神理”为“Divine Reason”,译“十翼”为“Ten Wings”。当然,译者也使用了很高比例的归化策略,毕竟任何译文均需要具有可读性。在这一意义上,归化策略也是跨文化交流必需的。就归化和异化的比例而言,林语堂的翻译应是一个可信的范例,因为其翻译和穿插于英语创作中的翻译(改写)在英语读者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对其翻译的5种典籍的对比研究表明,词汇的异化为27.7%,4种文化词的异化分别为37.9%、29.4%、15.2%、24.2%(秦楠,2007: 36, 52, 57, 61),其翻译的最高目标也是传播文化。相比之下,《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异化程度显得过高,尽管翻译目的相同。

##### 4.3 翻译发起者和译者个性

一般地,翻译发起者可以是个人、群体或机构,发起者确定翻译目的和整个翻译过程(Nord 1997/2001: 20)。《文心雕龙》的译者显然忠实地执行了发起者的决策,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发起者的翻译目的。当然,不同译者在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会表现出差异。例如:

(3)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待待:(《离骚》)

I instruct the carriages to be on the watch

For long and rugged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卓振英等,2005: 66)

(4)博见为饕餮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神思》)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are food for overcoming poor ideas a  
sense of unity is medicine for disorder

两种译文与原文的贴近程度显然有别:前者更多地偏离了原文的形式,而后者更多地保存了原文的措辞。翻译发起者完全相同,但翻译策略迥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Nord 1997/2001: 21)。至于汉语典籍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则另外撰文论述。

##### 4.4 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翻译总是为目标语读者提供阅读文本,这就要求译文尽可能满足这种阅读期待。“读者进入阅读时,主体心理上已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海德格尔称之为“前结构”,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创新期待”(朱立元,2004: 201-216)。英语读者在阅读汉语典籍英译本之前,对文本的可理解性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判断,从而形成对翻译策略的特殊制约规范(Aixel 1996: 66),因此翻译过程需要寻求满足读者接受能力的归化。但是,这种策略取向却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传播相悖,因为只有异化才能更有效地保存原文的他者性或异质性。为此,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某种调和或妥协则是必然的翻译策略选择。

《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选择较高度度的异化策略,较之林语堂的翻译而言,势必会给读者带来较大的阅读难度,但是归化策略的使用仍有很高的比例,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接受能力显著地影响了译者的策略选择(参见杨国斌,1996: 84)。不过,读者“结构图式”深层的创新期待又使其有可能接受并理解“闻所未闻”

的东西。而且,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因为阅读的不断丰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逐渐发生变化。这样,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由此发生改变。可见,阅读期待制约翻译策略的选择,后者也是改变前者的工具。

#### 4.5 译文文本连贯性

文本连贯由多种因素构成,词汇衔接即是其中之一,而词汇衔接又可以有多种方式(杨若东,1997:25—26)。如果文化专有项在译文中出现频率很高,那么即使采取异化策略也不大可能影响译文的连贯性。相反,如果文化专有项在译文中出现频率较低,那么过高度度的异化翻译或省略就会大大降低译文的连贯性和可读性。《文心雕龙》英译对“风骨”的处理虽然异化程度最高,但并不直接影响译文的连贯性,而有些部分的省略却不然。例如:

(5)……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此明理以立体也……

此隐义以藏用也。(征圣)

... lucidity or depth characterized his writing ... This is stylistic lucidity ... They are examples of hidden meaning

显然,原文以名词重复实现文本连贯,而译文前半部分省略了一些术语,因此后文的连贯受到显见的影响,省略“隐义”对连贯的影响更显著。可见,在汉语典籍的英译中,译文文本的连贯性对翻译策略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或者说产生了较高度度的制约。

#### 4.6 已有译本和定译

翻译文化专有项时,已有译本当然会明显地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严肃的译者都会认真查考以前的译本,吸取其中的优势。《大中华文库》出版之前,虽然汉语典籍的翻译“未成系统、规模,比较薄弱”,但是毕竟翻译出版了一些,《文心雕龙》除施友忠的英文全译本外,还有其他一些节译发表,而且译者均读过(杨国斌,1996:84),译者此外至少还研究过包括理雅格英译《易经》在内的其他汉语典籍英译本,并在翻译中有所参照。

汉语典籍中的有些文化专有项因此前的翻译而逐渐形成定译,如人名“Confucius”、地名“the Yellow River”、典籍名“The Book of Poetry”、文论术语“elegant”和“style”、哲学术语“Dao”和“hexagram”,以及诸多的朝代名。当然,出于多种原因,即使像“道”这样的术语,译者也用不同译名“the way of Dao”。可见,定译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也是相对的。

### 5. 结论

汉语典籍英译研究起步较晚,尚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究。上文试图以文化专有项理论为基础,通过统计和例证分析的方法,考查《文心雕龙》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并探究策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为汉语典籍的翻译策略寻求合理的解释。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观察翻译的整体特征,而且可以为汉语典籍翻译提供一种参照,同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方法论上的尝试。无疑,汉语典籍英译研究的意义不止于此,这种研究也许可以开启国内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进而为一般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学科建设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

### 注释:

①这个数字有误,《文心雕龙》全文应是47000多字,前25章25000多字,后25章22000多字。我们的研究所选内容4500多字,占全文10%弱。

### 参考文献:

- [1] Aixel J. 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A]. in Ramón Álvarez & M. Carmen Á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 [2] Hermans T. Translation Between Poetics and Ideology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994 (3).
- [3] Hermans T.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in Ramón Álvarez & M. Carmen Á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A].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2001.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6]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2001.
- [7]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2007.
- [8] 范祥涛. 论翻译选择的的目的性 [J]. 中国翻译, 2002 (6).
- [9] 范祥涛. 描写译学中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 [J]. 外国语, 2004 (4).
- [10] 范祥涛. 中国翻译通史·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篇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胡亚敏. 中西文论术语检讨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3).
- [12] 李春泰. 文化方法论导论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5.
- [13] 刘 颀. 杨国斌英译 周振甫今译. 文心雕龙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14] 秦 楠. 林语堂汉译英中的翻译策略: 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 [D].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 [15] 王 宏. 《墨子》英译对比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6).
- [16] 王 凌. 《大中华文库》大型翻译出版工程获阶段性成果 温家宝总理两次致信祝贺 [N].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5 (1).
- [17] 王晓路. 术语的困惑——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J]. 文艺理论研究, 1999 (4).
- [18] 杨国斌. 《文心雕龙》译后, 想到维特根斯坦 [J]. 读书, 1996 (1).
- [19] 杨牧之. 迎接新世纪文明的太阳——《大中华文库》总序 [N]. 新闻出版报, 2000 (3).
- [20] 杨若东. 衔接关系的建立与跨文化语篇理解 [J]. 外国语, 1997 (6).
- [21] 杨雪梅. 我首次向世界系统介绍中华文明——《大中华文库》第一辑出版发行 [N]. 人民日报, 2000 (5).
- [22] 张南峰. 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 [J]. 中国翻译, 2004 (1).
- [23] 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 [24] 卓振英 杨秋菊. 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辨——以《楚辞》为例 [J]. 中国翻译, 2005 (4).